

# 《海峡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协议》 对两岸司法协助制度的影响

李 智<sup>1,2</sup>

(1. 福州大学 法学院, 福建 福州 350108; 2. 武汉大学 法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60)

**摘 要:**为探索海峡两岸司法协助的有效路径,运用比较分析方法综观《海峡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协议》签订前后海峡两岸司法协助制度的演变,重点分析该协议所确定的刑事及民事司法协助内容及方式、海峡两岸司法协助的巨大进展及今后的发展趋势。分析认为,作为海峡两岸司法协助的重要阶段性成果,该协议的内容尚需进一步完善,其中特别是对司法管辖权冲突及互助中的法律冲突等问题,海峡两岸亟需达成更大范围的共识。

**关键词:**海峡两岸;司法协助;司法管辖权;法律冲突

**中图分类号:**D998.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6248(2009)04-0055-06

海峡两岸司法协助一直是学界及司法界关注的问题。在民事司法协助领域,学者们多从淡化主权因素,适用区际法律冲突规则的方式上寻求突破;在刑事司法领域,囿于政治因素,除相互遣返等问题外,鲜有涉及。2009年4月26日,海峡两岸关系协会和财团法人海峡交流基金会在南京正式签署了《海峡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协议》(以下简称《互助协议》)。作为海峡两岸司法协助领域第一份综合性合作协议,《互助协议》涵盖了民商事与刑事诸多司法过程,使海峡两岸司法界建立了直接、全面、深入的合作关系,不仅有利于维护海峡两岸人民的合法权益而且有利于海峡两岸交流交往的正常秩序。回顾海峡两岸的司法协助发展历程,《互助协议》的签订与海峡两岸近20年的司法协助实践密不可分。20年来,海峡两岸的司法协助历经曲折,围绕着刑事人员遣返、司法文书送达、调查取证以及民事判决、裁定和仲裁的承认与执行等问题,海峡两岸在各个时期分别做出了不同的制度安排。《互助协议》对此既有所继承,亦有所发展。

## 一、《互助协议》对海峡两岸刑事 司法协助制度的确认和完善

海峡两岸刑事司法协助的内容,主要体现在共同打击犯罪、刑事证据调查协作以及罪犯的移管及待遇方面,《互助协议》均在确认原有协作模式的基础上予以发展。

### (一) 确立了共同打击犯罪的“类案 协同与个案协助”模式

《互助协议》签订前,囿于海峡两岸前期的政治分立和对峙,双方互不承认对方法律的效力,在刑事司法协助领域无法建立起正式的互助模式,唯一与刑事司法相关的双边协定是涉及刑事人员遣返的《海峡两岸红十字会组织在金门商谈达成有关海上遣返协议》(以下简称《金门协议》)。

1990年发生的“闽平渔5504号闷死案”与“文山舰撞沉闽平渔5202号案”,凸显了台湾方面遣返

收稿日期:2009-05-30

作者简介:李 智(1972-),男,山东济宁人,福州大学副教授,武汉大学博士后。

偷渡人员所采取的措施非人道性,最后迫于舆论谴责不得不同意通过两岸的红十字会协同实施遣返活动。在此基础上,1990年9月,海峡两岸分别授权双方红十字组织于金门签署了《金门协议》。截至2009年1月根据《金门协议》,海峡两岸红十字组织共同实施双向遣返作业212批,双向遣返38936人<sup>[1]</sup>。《金门协议》开启了海峡两岸司法协作的走廊,并在实践中发挥着巨大作用,但在实施遣返作业时仍须通过民间机构,海峡两岸司法部门本身并没有建立直接联系。从适用对象上看,《金门协议》主要为一般刑事犯罪,较少适用于经济犯罪。2008年2月,大陆将台湾前中兴银行总经理王宣仁遣返台湾,标志着《金门协议》开始突破原有的刑事罪犯遣返的规定,将适用对象拓展至重大经济犯罪的嫌疑人。从适用范围来看,只限于人员遣返,在调查取证、犯罪情报共享等方面亦未作规范。从遣返程序上看,罪犯遣返只能依循金门对厦门、马祖对马尾这两条海上线路进行,难以满足海峡两岸共同打击犯罪的实际需要。

对于《金门协议》在遣返问题上存在的诸多未尽事宜,《互助协议》做出了详尽规定。第一,海峡两岸确立了“类案协同与个案协助”的司法协作模式。“类案协同”是指双方就彼此均认为涉嫌犯罪的行为共同进行打击,并着重打击重大刑事犯罪、经济犯罪、职务犯罪以及国际罪行;“个案协助”是指双方法律规定出现冲突,即双方对是否涉嫌犯罪认定不一时,双方同意在对案件有重大社会危害的共识下,针对个案进行专门的司法协助。可见,《互助协议》通过“类案协同与个案协助”模式既扩大且明确了刑事案件的协作范围,又解决了双方刑事法律的部分冲突问题,从而有效打击犯罪行为。第二,对于《金门协议》中未涉及的侦查协助问题,《互助协议》第5条明确规定:双方同意交换涉及犯罪有关情资、协助缉捕、遣返刑事犯与刑事嫌疑犯,并于必要时合作侦查、侦办。第三,刑事人员遣返方式更加多样化,《互助协议》在《金门协议》的基础上增加了海运与空运的直航方式,这意味着海峡两岸的人员遣返不必再从内地途经厦门或马尾,而可在当地直接进行。相应地,原本由海峡两岸红十字组织进行交接的模式可能也将随之调整。

## （二）刑事证据调查协作更加全面和具体

1994年中国公证员协会、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以及财团法人海峡交流基金会以民间协议的方式,就

海峡两岸公证书查证问题达成了《两岸公证书使用查证协议》(以下简称《查证协议》),随后又补充了《海协关于增加寄送公证书副本种类事函》(以下简称《增加事函》)。上述协议仅涉及海峡两岸民事公证书的查证问题,并未规定任何刑事证据调查协作制度。鉴于刑事证据的调查必然涉及公权力的行使,无法适用海峡两岸相互委托律师查证的方式<sup>[2]</sup>。因此,直至《互助协议》签订,海峡两岸在刑事证据调查领域才进入全面合作阶段。

《互助协议》第8条有关调查取证的规定,涵括了民事与刑事方面的证据调查协作制度。依据《互助协议》规定,双方的调查取证覆盖了证人证言、书证、物证、视听资料等七大类证据资料;此外,还依据现实需要,增设关系人所在与身份的确认、搜索及扣押两项措施;加之《互助协议》第18条对双方协助获得的证据资料给予互免证明待遇,使海峡两岸的刑事证据调查工作实现了直接合作,并将提高各自刑事调查及诉讼程序的效率,实现对犯罪行的有效打击。

对于刑事证据调查所产生之费用,《互助协议》第20条明确了鉴定费用、笔译费用、证人跨海出庭作证等资费应由请求方负担,这为海峡两岸刑事证据调查协作进一步清晰了具体操作形式。随着海峡两岸“大三通”的开启,海峡两岸人员互访将更加频繁,互访手续亦将日趋简便,这都为证人出庭作证提供了条件。

## （三）对罪犯移管与人道探视权予以明确

《互助协议》在刑事方面的重要变化,是对罪犯移管进行了原则性规定。理论上,罪犯一般由裁判地监狱执行,但鉴于现代刑法已将刑罚的目的定位为改造罪犯及预防犯罪,因此在海峡两岸生活习惯存有差异及往来频繁的情形下,将罪犯转交原籍地执行,使其能够获得亲属的探望和照顾,将有利于其改造。此类罪犯的移管需在互惠的基础上,在请求方、受请求方及被判刑人三方均同意的情况下,方能实施。

在出现无法移管的情形下,为保障罪犯的顺利改造以及亲属探视权利的实现,《互助协议》第12条规定了两岸刑事人员亲属的人道探视权,对于对方人员受人身限制、非病死、可疑为非病死等重要讯息,双方负有及时通知的义务;同时,要求双方应依照各自规程为家属探视提供便利。单就人道探视权而言,大陆曾就台胞会见在押未决的罪犯亲属做出

了单方规定。1988年《最高人民法院处理涉台刑事申诉、民事案件座谈会纪要》第4条规定:去台人员和台胞回大陆探亲期间,要求会见人民法院正在审理的在押未决犯的,一般可以准许。但会见的人犯所涉及案件只能是普通刑事案件;会见的人犯必须是去台人员和台胞的亲属;会见时要有监管人员在场。

## 二、《互助协议》对海峡两岸民事司法协助制度的确认和完善

民事司法协助主要涉及法律文书送达、调查取证以及裁判的承认与执行,由于海峡两岸经贸往来较为频繁,《互助协议》签订前双方针对上述问题都分别做出了安排和规定。但由于多是单边立法,冲突不断。《互助协议》关注了以往民事协助中的问题,并在送达义务确定、证据免证待遇以及裁判的承认与执行的原则等方面取得突破。

### (一) 确定民事法律文书送达义务

海峡两岸关于法律文书送达的实践最早可以追溯至1984年8月29日最高人民法院针对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的请示做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如何给在台湾的当事人送达法律文书的批复》。至此,大陆法院开始对于台湾当事人采用公告,并结合一方当事人转告被告送达当事人的方式,开展民事法律文书送达活动。但公告送达文书并不利于保护受送达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因此大陆法院在实践中还采取了邮寄送达、个人送达等方式。1990年1月26日,司法部发布了《司法部关于办理涉台法律事务有关事宜的通知》(以下简称《办理涉台事务通知》),确定了通过海峡两岸的律师合作完成文书送达的方式。

在总结长期实践的基础上,2008年4月22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涉台民事诉讼文书送达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文书送达规定》),明确了人民法院送达或者代为送达民事诉讼文书的范围,区分了受送达人住所位于大陆与台湾适用不同的送达方式,如同住成年家属、诉讼代理人或者指定代收人的代收送达等方式。在送达方式上,最高人民法院不仅认可了邮寄送达,更创新性地提出了传真、电子邮件的送达方式,并确定了在各种方式均不能送达或者台湾地区当事人下落不明的情况下,人民法院采取公告送达的权力。可以说,《文书送达规定》为人民法院实施涉台法律文书的送达

提供了详尽而操作性极强的标准和方式。

反观台湾地区,在《互助协议》签订之前,主要依据1992年颁布的《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以下简称《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第8条的规定:应于大陆地区送达司法文书或为必要之调查者,司法机关得嘱托或选择第4条之机构或民间团体为之。此即由其“司法院”及相关机构委托财团法人海峡交流基金会处理有关向大陆送达文书等事项。此外,台湾地区的法院还依其“民事诉讼法”的规定适用公示送达的方式对大陆居民送达法律文书。

现今《互助协议》第7条不仅确定了双方尽最大努力相互协助送达司法文书的义务,更对文书送达工作的完成限定了具体时间。因此,《互助协议》的签订开通了海峡两岸的文书送达协作之路,改变了此前大陆与台湾的隔离状态,为克服公告等送达方式所存在的缺陷走出了实质性的一步。

### (二) 民事调查取证的互助更加广泛和便捷

海峡两岸民事诉讼案件及民事法律关系的判定,均需要各方住所所在地公证部门公证的证据加以佐证,因此,双方出具的公证书的效力、使用和查证等问题都需要双方予以规范。《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第4条第1款规定:行政院得设立或指定机构或委托民间团体,处理台湾地区与大陆往来有关之事务。第7条规定:在大陆制作之文书,经台湾行政院设立或指定机构或委托之民间团体验证者,推定为真正。这单方面规定了以财团法人海峡交流基金会为中介的文书查证方式。与此相对应,1994年中国公证员协会、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以及财团法人海峡交流基金会以民间协议的方式,就海峡两岸公证书查证问题达成了《查证协议》及《增加事函》。双方同意相互寄送涉及继承、收养、财产权利证明书等14种公证书副本,文书真伪的查证可以通过比对方式加以确认,免除之前使用函查方式所需的繁琐程序。对于公证文书以外的文书,双方则达成了个案处理的共识。此外,依据《办理涉台事务通知》的规定,目前海峡两岸的律师事务所之间可以开展合作业务,进行民事案件的调查取证工作。

在《互助协议》框架下,海峡两岸民事调查取证的范围更加广泛、效力更强、形式更简捷。第一,《互助协议》第8条、第18条、第20条分别就调查取证的范围、效力、费用等问题进行了规定,明确了除传统的公证书证据之外,案件当事人与审判机关还可依据对方在互助制度下取得的证据进行举证;第

二,《互助协议》确定了双方就民事与刑事案件的证据调查予以协助义务,请求方可就证人证言、书证等一般民事证据要求对方进行协助取证;第三,《互助协议》给予海峡两岸调查所获证据以免证待遇。

### (三) 确立了民事判决、裁定以及仲裁裁决承认与执行的原则与方式

在《互助协议》签订前,海峡两岸并无对民事裁判以及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的合作协定,仅各自做出了单方规定。台湾方面,《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第74条规定:在大陆地区作成之民事确定裁判、民事仲裁判断,不违背台湾地区公共秩序或善良风俗者,得申请法院裁定认可。前项经法院裁定认可之裁判或判断,以给付为内容者,得为执行名义。此即在确认对大陆法院裁判和仲裁裁决予以承认和执行的同时,设定了“公共秩序保留”原则为承认与执行的原则;并借1997年修订《两岸人民关系条例》、1998年修正《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施行细则》之际,又增加了对等原则,程序方面则设置了制定机关和民间团体认证环节,使申请人在台湾申请承认和执行大陆法院的民事裁判和仲裁裁决时,必须经过繁琐的程序,而仅民间机构验证这一项要求,即大大削弱了该制度的实施效果。大陆方面,1998年5月,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认可台湾地区有关法院民事判决的规定》(以下简称《认可规定》),对申请认可台湾地区有关法院民事判决和民事裁定的有关法律效力问题做出了明确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于1999年和2001年再次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事人持台湾地区有关法院民事调解书或者有关机构出具或确认的调解协议书向人民法院申请认可人民法院应否受理的批复》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事人持台湾地区有关法院支付命令向人民法院申请认可人民法院应否受理的批复》,进一步明确了台湾地区法院做出的判决、支付令、民事调解书予以承认与执行的条件,究其所设定之标准亦较为严格<sup>[3]</sup>。可见,海峡两岸在对相互民事判决和裁决的承认与执行方面,往往以不违反本地区的法律原则或公共秩序为条件,由于政治的因素、社会制度的不同,公共秩序保留则可能被滥用。在申请程序上,承认与执行的认可过程也过于繁琐。海峡两岸有关承认与执行制度单边立法的模式及其执行标准使相互间民事裁判和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冲突不断。

《互助协议》针对上述弊端,对双方原有的制度进行了改良:第一,明确双方在承认与执行对方民事

裁判及仲裁裁决时应基于互惠原则及公共秩序保留原则,同时软化了公共秩序保留原则的内容,降低了承认与执行的标准,避免公共秩序保留原则被滥用;第二,在申请程序上,取消了台湾地区在承认与执行程序中所要求的民间机构验证环节,这一程序性的变化大大便捷了申请人申请对方法院承认和执行判决与裁决的行为。

## 三、《互助协议》的限制及发展路径

众所周知,涉台法律问题一直以来不仅仅局限于法律问题,本质上包含着政治因素<sup>[4]</sup>。相应地,海峡两岸刑事与民事司法协助领域的发展也伴随着海峡两岸关系的起伏而具有阶段性和渐进性的特点<sup>[5]</sup>。在《互助协议》签订之前,基本采取“各自立法、个案协助”的司法协助模式,司法协助的原则模糊,标准严格,程序复杂。《互助协议》的签订有效弥补了先前模式存在的缺陷,许多方面已多是从法律技术的角度进行安排。但受困于海峡两岸的特殊关系,司法主权问题突出的许多方面,《互助协议》尚无涉及。海峡两岸因法律规定不同而产生的一些法律冲突问题,也因为技术上的原因需进一步协调。

### (一) 司法主权突出的问题需协调

由于存在一些涉及司法主权的法律问题,双方在现今的政治环境下尚难以完全形成共识,《互助协议》的涵盖范围及互助关系确定等方面均受到一定限制,无法进行全面的安排,有待寻求更好的解决路径。

#### 1. 未涵盖司法协助所涉及的全部领域

《互助协议》虽确立了范围广泛的司法协助制度,但未对标志着司法活动开始的司法管辖权问题进行规范。而司法管辖权的确定往往会对法律适用和判决结果起到直接作用,并影响到刑事侦查和取证、民事判决的承认与执行等活动的进行,依冲突法规则,管辖权的非正当行使会导致裁决被拒绝承认与执行<sup>[6]</sup>。对于不予协助的情形,《互助协议》第15条做出了规定:对于请求内容不符合己方规定的情形,受请求方得不予协助。但对“请求内容不符合己方规定”并无明确说明,此种弹性规定可能会使双方以管辖权行使不正确为由而给司法协助带来困境。可见,对如何协调海峡两岸司法管辖权冲突没有能够形成共识,是《互助协议》的重大缺憾。

解决海峡两岸司法管辖权冲突,在路径选择上

应淡化司法管辖权所包含的司法主权内容以及因此凸显的政治隔阂。在制度设计上,(1)将“判决自由流动原则”作为首要的管辖权冲突协调原则。“判决自由流动原则”是欧盟《建立欧洲共同体条约》为民商事诉讼领域有关冲突确立的一个总的原则。该条约第20条规定:“成员国应在必要时相互进行谈判,通过简化彼此之间在法院判决或仲裁裁决方面相互承认与执行的方法,以达到保障其国民利益的目的”。此原则不要求管辖权的行使必须以判决可以得到承认与执行为前提,而是强调判决在各成员国之间相互承认与执行,为管辖权冲突协调指明方向,并不直接影响管辖权的确定<sup>[7]</sup>。此种原则的适用无疑也会降低海峡两岸司法管辖权协调的难度。(2)在民商事领域,应充分尊重当事人之间的管辖协议,而对于因海峡两岸专属管辖规定不一而产生的管辖协议的争议,双方也应经过协调,使管辖协议有效为选择适用何方专属管辖规定的标准。(3)为避免管辖权冲突,海峡两岸应废除排斥对方管辖权的规定,如台湾地区《两岸人民关系条例》中排斥大陆管辖权、歧视大陆人民的规定<sup>[8]</sup>;同时,在技术上应禁止适用某些易产生管辖权冲突的管辖根据,如被告财产所在地或扣押地。(4)确立合理的“先受理法院原则”。“先受理法院原则”往往建立在可望得到后受理法院承认与执行的基础上,即如先受理法院享有管辖权,且可望在合理期限做出在得到后受理法院承认的判决时,后受理法院应中止诉讼程序。海牙国际私法会议1999年《民商事管辖权及外国判决公约》(草案)第21条淡化当事人的身份和住所地等一般管辖根据,更多地考虑诉因发生地管辖根据,由诉因发生地法院优先受理,以利诉讼<sup>[9]</sup>。

## 2. 互助关系仍受制于政治因素

互助关系受制于政治因素,对原有某些制度的承认过程中仍未解决既存问题。以遣返制度为例,虽然《互助协议》从遣返人员的范围、遣返方式等方面对刑事人员的遣返制度进行了完善,但《金门协议》中缺陷仍然存在:在《金门协议》中,双方虽然采用了“遣返”一词,但在协议实施过程中,台湾地区方面始终将海峡两岸的遣返移交等同于国与国之间的引渡,坚持“己方人民不遣返”、“政治犯不遣返”、“宗教和军事犯不遣返”、“已进入司法程序不遣返”等原则,使遣返制度未能完全得到执行。这些保留本身违背一个中国原则,但《互助协议》仍未阐明对这些问题的态度,从而为实践中可能继续产生的冲突留下了隐患。

对于此类问题,应该看到积极的一面,即在协议形成过程中已将协议地位问题弱化,用词上已进行了调整,如“遣返”一词从谈判的角度来看已突破了政治隔阂,达成了共识。另外,在共识之下的冲突多是在执行协议过程中出现的,对于适用“遣返”的原则往往是双方根据相互关系的走势并结合个案的情形最终决定。因此,在海峡两岸政治关系没有更全面变化的情况下,在协议内容上形成共识,实践中以积极态度执行,是双方解决此类政治敏感度较高的法律问题的主要方法,也体现了《互助协议》所确立的“类案协同与个案协助”的协助原则。

## (二) 司法协助过程中所涉及法律的冲突尚待协调

《互助协议》对司法协助的诸多方面进行了安排,但毕竟是一个框架性的协议,目的在于明确双方协助义务。但对于执行过程中所涉及法律的冲突问题,《互助协议》目前尚无力予以解决。

在有关邮寄送达法律文书的规定中,大陆采取“收信”主义,而台湾方面遵循“发邮”主义<sup>[10]</sup>,送达时间的起算点即出现差异,给随后进行的司法活动的程序正义理解造成不必要的分歧。此外,由于大陆《文书送达规定》中承认了电子邮件等新型送达措施,其能否得到台湾方面的认可亦有待观察。可见,《互助协议》仅对文书送达的时间限制、费用负担等问题做出了规定,却忽略了其中的法律冲突。

《互助协议》虽然统一了海峡两岸承认对方民事判决所需的实体要件,但未对其程序性要件进行规范,从而出现现行规定的程序性规范隐含冲突的问题,如在《认可规定》中,大陆法院限定了当事人申请认可台湾地区有关法院民事判决的时效,但台湾地区的法律未有此规定。

可见,由于法域的不同,海峡两岸的区际法律冲突始终是双方司法协助的法律障碍,法律冲突的协调需借助冲突法途径,通过协商逐步消除冲突,这是一个艰苦的过程。这归结到司法协助所涉之法律冲突,《互助协议》目前虽力有不逮,但仍将起到重要作用。《互助协议》是双方在共同执行协议的过程中讨论如何消除法律冲突奠定了基础。对于司法协助中所涉法律存在的冲突,到底哪些是实质性的、冲突会产生怎样的障碍、怎么协调最好、哪一方更应该让步等问题,都需要双方伴随着司法协助的实践进行总结。所以,跳过法律冲突,先形成《互助协议》,转而借助协议的执行逐步消除协助中的法律冲突,不失为海峡两岸司法协助取得进展的方式。

## 四、结 语

综观海峡两岸司法协助的发展历程,既顺应双方地缘及商贸交往的状况而不断调整,又囿于政治因素在立法模式及具体制度方面各自为战。可以说,双方在司法协助的道路上走走停停,艰难前行。《互助协议》的签订,是海峡两岸长期协商和实践的阶段性和成果,也是双方关系缓和在法律上的体现。它突破了一些政治隔阂,在司法协助问题上形成共识。同时,在协商技术上也采取了一些先达成协议后进行技术调整的方法,使海峡两岸司法协助制度取得了较全面的进展。虽然在对一些司法主权内容较多的领域尚没有涉及,但已形成的内容以及谈判协商的方式不仅为今后海峡两岸司法协助和协调法律冲突构建了基础,而且为海峡两岸关系的发展提供了一种模式和途径。

### 参考文献:

- [1] 佚名. 金门协议签署以来两岸红十字组织双向遣返 38936 人 [EB/OL]. (2009-02-11) [2009-05-06]. [http://www.chinanews.com.cn/tw/lajl/news/2009/02-](http://www.chinanews.com.cn/tw/lajl/news/2009/02-11/1558422.shtml)

11/1558422.shtml.

- [2] 唐荣智,陶旭东,李阿吉. 海峡两岸司法协助研究:两岸司法协助的范围[J]. 福建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00,2(2):45-49.
- [3] 王建源. 论两岸民事司法中判决的认可与执行问题[J]. 台湾研究集刊,2004,22(4):38-46.
- [4] 于 飞. 论海峡两岸民商事法律冲突的特殊性[J]. 法律科学,2005,23(4):111-116.
- [5] 曾 涛. 海峡两岸司法协助模式新探[J]. 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7(3):42-45.
- [6] 韩德培. 国际私法新论[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0.
- [7] 罗剑雯. 论欧盟民商事管辖权体系对协调我国区际民商事管辖权冲突的启示[J]. 法学评论,2004,25(3):86-91.
- [8] 朱维究. 台湾当局“涉及两岸关系立法”之研究[J]. 比较法研究,1999,13(3/4):414-418.
- [9] 李 智. 海峡两岸民商事案件管辖权的冲突及协调[J]. 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27(6):64-68.
- [10] 肖建华. 海峡两岸民商事区际司法协助制度之构建[J]. 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19(1):10-16.

## Impact of Agreement of Jointly Cracking down on Crime and Mutual Legal Assistance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on the cross-strait system of judicial assistance

LI Zhi<sup>1,2</sup>

(1. School of Law, Fuzhou University, Fuzhou 350108, Fujian, China; 2. School of Law,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60, Hubei, China)

**Abstract:** As the first comprehensive cooperation agreement in the field of cross-strait judicial assistance, *Agreement of Jointly Cracking down on Crime and Mutual Legal Assistance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is the summary of two sides practice of judicial assistance which lasts for many years. As the evolution of cross-strait judicial assistance is concerned before this agreement was signed, and after the specific contents and manners of mutual legal assistance identified by this agreement are analyzed, it is found that there is significant progress in cross-strait mutual legal assistance. And though it is an important achievement in cross-strait mutual legal assistance, the contents of the agreement still need to be further improved. The two sides need to form a wider consensus on the coordination of the conflicts of judicial jurisdiction and the legal conflicts which still exist in the judicial assistance.

**Key words:** cross-strait; judicial assistance; judicial jurisdiction; conflict of law